

关于朱元璋出生前后的“圣瑞”问题

夏维中 吴恬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明代官方编撰朱元璋出生前后“圣瑞”的年代,大致是在永乐初期;“圣瑞”编撰的依据,主要是采用了北方民族“感光诞子”的传说以及宋元时期汉人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在永乐初期以前,即在朱元璋在世之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圣瑞”之说,而与此相关的人物、地点以及遗迹等等,更是无从谈起。但在永乐以后,这一传说却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内容上的扩充和地点上的变化,最终出现了引起争议的新文本。

关键词:朱元璋;圣瑞;感光诞子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0)02-0072-05

On the “auspicious signs” around the birth of Zhu Yuan-zhang

XIA Wei-zhong WU Tia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official recording of the “auspicious signs” around the birth of Zhu Yuan-zhang started from the early Yongle reign. The basis of such a narration were the popular legend of “sunshine-fertilization (gan’guang danzi)” of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folklore by the Han peopl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Prior to the early Yongle reign, when Zhu Yuan-zhang was alive, stories of “auspicious signs”, and the relevant people, places and remains did not exist. Since then, with the wide spreading of this legend, more details has been added and places also been changed. Eventually, a new contending text emerged.

Key words Zhu Yuan-zhang; auspicious signs; sunshine-fertilization

《明史》中有关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前后的“圣瑞”记载^①,影响极大。人们大多视之为俗套,或习以为然,或不以为然。其实,这一传说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渊源,而其在明代的流传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变化,更是扑朔迷离,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解读和考辨。

一、“圣瑞”最早的文本编撰

朱元璋在世时,对自己身世交代得相当清楚和坦率。现存最早的相关文献,是龙凤九年(1363)朱元璋自撰的《朱氏世德碑》。该文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其家世渊源及其出生之事:“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有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初一公长子)

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因至钟离同居……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朱元璋)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②洪武二年(1369)所撰的《皇陵碑》,也是较早的相关文献。此碑虽由危素最终润色成稿,但据碑文中“臣(李)善长以上手所录,付词撰文”^③一语可以推定,其基本内容应是先由朱元璋拟定的。其中相关的记载为:“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

^①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本纪第一·太祖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②③}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0页。

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长兄侍亲,仲兄、三兄皆出赘,既而复迁太平乡之孤村庄。岁甲申,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①由此可见,朱元璋在世之时,并未提及他出生前后出现的“圣瑞”现象。其它文献也无相关的记载。现存最早记载“圣瑞”现象的文本,出现在永乐初期。永乐三年(1405),在以明成祖朱棣名义撰写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中,开始出现“圣瑞”现象的描述:“皇曾祖熙祖裕皇帝居泗州,皇祖仁祖淳皇帝居濠州。皇考生焉……初,皇妣妣淳皇后,梦神馈药如丸,焯焯有光,吞之,既觉异香袭体,遂娠皇考。及诞之夕,有光烛天。”^②

在现存的《明太祖实录》中,这种描绘则更为生动具体:“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积善,隐约田里。宋季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③

众所周知,《明太祖实录》前后经历了建文元年(1399)、永乐元年(1403)、永乐九年(1411)到十六年(1418)三次修撰,其中由姚广孝、夏元吉主持的第三次修撰,改动较多,因而无法确认上述文字的具体写作年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文字的写作年份,最早也不会早于建文元年,即在朱元璋过世之后。如果比较一下《孝陵神功圣德碑》与《明太祖实录》中的相关内容,也不难看出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的一脉相承关系。由此可以推断,“圣瑞”的编撰极有可能始于永乐朝。

二、“圣瑞”编撰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此类“圣瑞”现象的编撰依据,源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儒家神学理论中“五德始终”(又称“五行始终”)的理念。朱元璋起自南方,南为火,以火德王,色尚赤,因此,相关的传说也突出了“火德”主题。如明人黄瑜在《双槐岁钞》中就直接使用《圣瑞火德》来命名。

其实,以火德来解释“圣瑞”,并不一定正确。这些“圣瑞”的出现,应该另有其传承的渊源,即与宋元以来传入中原的中亚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

日本学者三品彰英认为,中亚各国与中国北方满蒙各族在民族文化上具有历史联系。而在王权与对太阳神

的崇拜方面,土耳其、蒙古及古代东方各国又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这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太阳崇拜的影响。在三品氏对亚洲这类“感精神话”进行研究时,他将以感精作用为基础的超自然力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雷电与星辰的光芒,第二类是天降灵物,第三类是阳光(“感光诞子”)。他认为汉民族的传说主要是借用第一和第二类的超自然力,满蒙各族以及受其影响的朝鲜、日本则是第三类居多。同时,他也认为汉民族的这类神话,虽然在文献上对北方各族在“圣瑞”意象的使用方面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们只是被学者们创作出来的,与民族生活不具备内在的联系。而在北方各族,以及朝鲜、日本,他们的日光感精神话则是与他们的日神崇拜息息相关的。他们通过说明其始祖乃是感应日光而生,来证明其神性,取得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并且证明其后代均是神裔。这些观念在历代帝王即位时祭祀太阳的礼仪中得到体现^④。

中国学者钟焯在研究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时,也注意到了北方民族记述的这类现象。他不仅引用了中唐人姚汝能所编《安禄山事迹》中有关安禄山出生时的“怪兆奇异”现象的记载,即“是夜赤光傍照,群星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之景象(此说也为后来的《新唐书》所采用),而且还大致梳理了十六朝以来北方民族君主的出生传记中有关“感光而妊”的事例。但不同于三品氏的地方在于,他认为“感光诞子”的源头并非日神崇拜,而是古代突厥—蒙古人对“天”的崇拜。“感光而妊”的过程是北亚民族中盛行的萨满教信仰世界中精灵附于人体行为的反映,因为精灵附体正是“像光那样降临下来的”。“感光而妊”,也是萨满教信仰中“王权神授”观念的一种表现^⑤。不过,王小甫对此却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安禄山是基于北方民族中普遍的拜火教(又名祆教)信仰,用“赤光”等“圣瑞”之象来神话自己,以成为胡人首领的^⑥。

不管是出于日神崇拜、萨满教信仰,或是拜火教(又名祆教)信仰,满蒙地区的这类传说是与他们的宗教民族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而对于汉民族而言,三品氏还注

①郎瑛:《七修类稿》,第79页。

②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260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1。

④三品彰英:《神话与文化史》,《三品彰英文集》第3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501—528页。

⑤钟焯:《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王小甫:《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意到,这类传说和汉族君主产生联系的时代不早于宋代,并由此推测汉族地区的此类神话应是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这些现象并不能在本民族的其他宗教文化生活中得到验证。

事实上,在《旧唐书》《新唐书》的帝王本纪中,我们也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类似“圣瑞”的记载。而在元人脱脱所撰的《宋史》中却比比皆是,兹罗列如下^①:

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照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②。

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讳灵,初名匡义,改赐光义,即位之二年,改今讳,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宪皇后杜氏。初,后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时晋天福四年十月七日甲辰也^③。

真宗应符合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讳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乾德五年,五星从镇星聚奎。明年正月,后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④。

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讳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梦两龙与日并堕,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满室,或见黄龙游光中^⑤。

神宗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頊,英宗长子,母曰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⑥。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讳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曰钦圣皇后朱氏。熙宁九年十二月七日己丑,生于宫中,赤光照室^⑦。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讳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显仁皇后韦氏。大观元年五月乙巳,生东京之大内,赤光照室^⑧。

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讳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孙也。……王夫人张氏梦人拥一羊遗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青衫闸之官舍,红光满室,如日正中^⑨。

宁宗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睿恭孝皇帝,讳扩,光宗第二子也,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为恭王,慈懿梦日坠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于王邸^⑩。

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讳昀,太祖十世孙。父稀獐,追封荣王,家于绍兴府山阴县,母全氏。以开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桥里第。前一夕,荣王梦一紫衣金帽人来谒,比寤,夜漏未尽十刻,室中五采烂然,赤光属天,如日正中^⑪。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讳禛,太祖十一世孙。父嗣荣王与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绍兴府荣邸。初,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神言:“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是夕,齐国夫人黄氏亦梦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⑫。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宋代帝皇的“圣瑞”描述中,“赤光”(偶为“红光”)已成为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与前引安禄山出生时的“怪兆奇异”以及朱元璋出生时的“圣瑞”,是何等的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帝皇的出生“圣瑞”,数量大大增多,已不再局限于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或其先祖。这已明显不同于此前北方民族的做法。

日本学者出石诚彦早在1935年就注意到了朱元璋出生时的“圣瑞”现象。他的观点今天看来虽大可商榷,但其前后贯通的研究方法仍值得今天借鉴:

关于明太祖的诞生,《明史》卷一载:“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赴,至则无。”《明史稿》《皇朝本纪》(纪录汇编卷六十一)、《明

①日本学者出石诚彦较早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见其《对中国帝王传说的一项考察》,《东洋学报》第23卷,第1号(1935年),第12、13、22、23页。

②脱脱等撰:《宋史》卷1《本纪第一·太祖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③脱脱等撰:《宋史》卷4《本纪第四·太宗一》,第53页。

④脱脱等撰:《宋史》卷6《本纪第六·真宗一》,第103页。

⑤脱脱等撰:《宋史》卷13《本纪第十三·英宗》,第253页。

⑥脱脱等撰:《宋史》卷14《本纪第十四·神宗一》,第263页。

⑦脱脱等撰:《宋史》卷17《本纪第十七·哲宗一》,第317页。

⑧脱脱等撰:《宋史》卷24《本纪第二十四·高宗一》,第439页。

⑨脱脱等撰:《宋史》卷33《本纪第三十三·孝宗一》,第615页。

⑩脱脱等撰:《宋史》卷37《本纪第三十七·宪宗一》,第713页。

⑪脱脱等撰:《宋史》卷41《本纪第四十一·理宗一》,第783页。

⑫脱脱等撰:《宋史》卷46《本纪第四十六·度宗》,第891页。

史纪事本末》等皆有文字略异的记载。《旧五代史·梁书》中率先记载类似事例,在“太祖纪”中记载太祖诞生时,记有:“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庐舍俨然”。朱元璋的传说与其它传说形似而异趣,具有其本身的丰富含义。也许是因梁太祖朱晃同样姓朱,明人便嫁接至朱元璋的身上;也许并非特意取用,而是陈述朱元璋传说时的偶然巧合。究竟是哪种原因,还不能骤下结论,但可推测具有一定关系^①。

尽管未必清楚这一传统的来源,但明初的文官们对这类“瑞象”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如在明初成书的《元史》中,就对蒙古氏族先祖的出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其史源应该来自于《蒙古秘史》^②):“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健,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靛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叉儿也。”^③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永乐朝的文官们在编撰朱元璋的“圣瑞”时,一定是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启发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糅合了汉族原有的相关传统要素。而“圣瑞”的官方构建,之所以要到永乐时期(或稍早的建文)才出现,主要是因为朱元璋在世时反对(至少是不鼓励)像先前的帝皇那样,对其先世及个人的经历进行杜撰或神化。而明成祖却与此相反,他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在即位之初就开始极力编撰此类神话,并赋之于特殊地位。

三、“圣瑞”的流传及重新构建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基本确定两点:一是官方编撰朱元璋“圣瑞”的时代,大致是在永乐初期;二是“圣瑞”编撰的依据,主要是采用了北方民族“感光诞子”的传说以及宋元时期汉人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永乐初期以前,即在朱元璋在世之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圣瑞”之说,而与此相关的人物、地点以及遗迹等等,更就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过,在《孝陵神功圣德碑》和《明太祖实录》这些官方文本出现之后,“圣瑞”传说就开始在朝野流传开来。其流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知识分子编撰的文本,二是百姓的口头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两者之间不断互动、兼容,其内容、地点以及人物等,也被不断叠加、转化甚至附会,最终构建出了全新的文本。

文人编撰的稗官野史,对“圣瑞”传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其脉络也比较清晰。现存较早记述“圣瑞”的此类著述有两种:一是《皇明小史》,二是《天潢玉牒》。后来大量稗官野史的相关辗转抄载,其史源大

致都出于上述两书。尽管两书的作者皆已失考,但我们仍可以基本推定其成书的大致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皇明小史》的写作时代,大致在永乐时期或稍晚。而《天潢玉牒》一书的写作,则肯定是在永乐朝,《四库全书总目》对此已经明确指出:“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则永乐时编也。其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④《皇明小史》和《天潢玉牒》中的相关记载,与《明太祖实录》和《孝陵神功圣德碑》中的相关内容虽稍有出入,但基本相合。由此可见,两书的作者,极有可能是那些可以接触到官方文本的高级文官,其编书的目的,大概是要把官方文本中的“圣瑞”之类说法传播出去。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两书的作者本身就是官方文本编撰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在通过稗官野史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内容上的扩充和地点上的变化,最终出现了新的文本。

《天潢玉牒》中相关记载如下: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熙祖生于宋季元初,太后王氏,长寿春王,次仁祖淳皇帝。渡淮,因家泗州。太后陈氏,四子,长南昌王,次盱眙王,次临淮王。仁祖年五十迁钟离之东乡。天历元年戊辰,龙飞濠梁。

按: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常言荆、涂二山为濠州朝岗,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降诞。适遇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来坐场中,以筒拔白丸置手中,太后问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要时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所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香经宿不散^⑤。

《皇明小史》之《毓圣开基》篇称:

高皇帝先世为句容县朱家巷人。迨其大父熙祖始迁

^①出石诚彦:《对中国帝王传说的一项考察》,《东洋学报》第23卷,第1号(1935年),第24、25页。

^②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③宋濂等撰:《元史》卷1《本纪第一·太祖》,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页。

^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页。

^⑤佚名:《天潢玉牒》,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8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于泗州,及皇考仁祖又迁于濠州之西乡。太后陈氏生四子,长封南昌王,次封盱眙王,又次封临淮王,高帝乃季子也。先是,太后梦一神,朱衣象简,馈药一丸,光彩焯焯,太后吞之。自是有娠,及将诞,异香绕室,红光烛天,经宿不散,时有(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上既生,仁祖至河上汲水澡浴(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以衣之,于是所居遂名“红罗巷”。自此空中常有神光,每将卧,灼烁如焚,以为失火,亟起视之,无有也。如是者月余旬日^①。

《灵迹乡神异》篇又称:

上诞于盱眙县灵迹乡之土地庙。夜半而生,有火光口然。明日庙忽自移于东路,至今其地方圆丈许寸草不生。迨上登极后,封其庙神为都土地^②。

这些记载,与前引《孝陵神功圣德碑》和《明太祖实录》这些官方文本中的相关内容有着明显的沿袭关系,但增加了“红罗”、“土地庙”等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重点在于突出“圣瑞”内容的描述和扩充,而非特别关注朱元璋的出生地。这也导致了该地名记述上的混乱,如上引的史料,对出生地的记述并不一致,或称“钟离之东乡”、或称“濠州之西乡”、或称“盱眙县灵迹乡之土地庙”。而在《皇明小史》之《濠州王气》篇中,又言濠州是“高皇帝(朱元璋)聿兴之所”^③。但也正是这种混乱,使“圣瑞”传说在内容扩充的同时,其地点开始发生转换。

在此后的文本中,“圣瑞”的构成要素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其发生地的相关记述却变得更加混乱。像“濠州之钟离东乡”的传统说法,虽仍为不少文人所坚持,但也不可否认,盱眙县“灵迹乡土地庙”之说,也开始广为流传,当然更有将钟离县太平乡的皇觉寺与盱眙县灵迹乡混为一谈的记载,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但是,盱眙县灵迹乡为什么会成为“圣瑞”传说重新构建中的发生地呢?而其影响如此之大,竟然会引起对朱元璋出生地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争论,这确实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因此,对于当时出现的有关盱眙县灵迹乡众多的“圣瑞”传说,今天大概已不能再套用“大抵多委巷之说,其谬妄固不待辨”^④的旧说来评价了,而是应该进行重新诠释。现在看来,盱眙县灵迹乡之所以能成为传说中的“圣瑞”发生地,确实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条件。朱元

璋家族早期的迁徙经历,使其与盱眙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朱元璋的祖父母就葬在该县(祖陵),朱元璋的外祖父家族也在该县。同时,盱眙县尤其是后来所称的灵迹乡,与朱元璋自称的出生地“钟离之东乡”非常相近,而明初地名的变更也使盱眙县具有巨大的联想空间。诸如此类的有利条件,加上帝乡荣誉感的刺激,使盱眙县很容易与“圣瑞”传说互相联系起来,并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不断予以具体化和形象化,使之落地生根。盱眙原有的一些地名、遗迹等纷纷被附会甚至更名,成为传说的载体、帝乡的符号。久而久之,“圣瑞”传说也就逐步成为盱眙民众的集体记忆,被不断传承、延续。这种集体记忆,在强化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或者鼓励地方精英在重新编写地方史乘之时,把这些传说及相关的内容纳入其中,成为固化的官方文本。而这种官方文本的不断出现,反过来又会推波助澜,不断推动和强化传说的传播。明代中后期盱眙县的朱元璋“圣瑞”传说的不断构建,正是经历了这一轮回。

作者简介:夏维中(1965-),男,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吴恬(1986-),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瑞

①②《皇明小史摘抄》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32页。

③《皇明小史摘抄》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33页。

④永瑛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2《史部·杂史类存目一·小史摘抄二卷》,第476页。